

DUKU

读库

1605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DUKU



主编 张立宪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. 1605/张立宪主编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6.11

ISBN 978-7-5133-2367-3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. ①I217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7801号

读库1605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57268861

官方网站: 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770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11

版次: 2016年11月第一版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2367-3

定价: 30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读库联系调换。客服邮箱: 315@duku.cn

目录

- 1 甘而可自述 王天兵 整理
无论做什么，要做就做最好的。如果做不到最好，那就赶快去改行，你必须在另一个领域做到最好才行。
- 103 非走不可的弯路 艾 苓
他们是我的学生，是挨过巴掌的云。
- 155 诗的 杨 照
我对现代诗，一直心存感激。
- 224 天花旧事 朱石生
拿破仑指着信末的署名说：“我不能拒绝这个人的任何要求。”
- 281 失落的乌托邦 洪 韵
融合了先前各种艺术形式精华的第九艺术，正在默默无闻地进行着属于自己的“文艺复兴”。
- 328 圣主朝朝暮暮情 辛上邪
唐玄宗李隆基的情事。

甘而可自述

王天兵 整理

无论做什么，要做就做最好的。如果做不到最好，那就赶快去改行，你必须在另一个领域做到最好才行。

2012年2月11日初访

2013年8月22日录音采访

2015年4月7日—9日录音采访

2015年8月19日—27日完成初稿

2015年11月2日完成第二稿

2015年11月27日完成第三稿

2015年12月4日修改于西安

经甘而可先生本人校对，2016年2月4日定稿于西安

我已到了花甲之年。这几年，各种荣誉接踵而至。2009年，我被文化部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（徽州漆器髹饰技艺）传承人；2010年，我的作品红金斑菠萝漆大捧盒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；2012年，我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。其实，我小时候并没有想成为什么“家”，这些荣誉都是水到渠成。

虽然作品影响越来越大，但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变化，我还生活在儿时成长的地方——屯溪。



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甘而可。

水乡童年

我1955年3月10日出生，是古徽州（现黄山市）屯溪人，父母也都是屯溪人。

我祖籍江西，从曾祖父那辈起，我们家就搬到徽州了。我爷爷在屯溪是做茶叶包装箱的木工和漆工，他带几个人做，创下了一些基业。但他那一代漆工手艺还谈不上艺术，只是民间的活计。爷爷过世比较早，才六十多岁就走了。我哥哥记得见到过他，我太小，没印象了。我父亲在家里是老大，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母亲在家排行第二，她有一个姐姐，一个妹妹。

我父亲出生在南昌附近的丰城，家里生活还算好，少年时在徽州的西溪南中学读到民国的初中，人相当聪明，字也写得漂亮。我岳父和我父亲是同学，关系非常好，两个人的字都写得很好。

我父亲早年在江西当过乡村小学教师，在那里跟我母亲认识，抗战后他回到屯溪，新中国成立前不久，土改工作组让我父亲跟随他们去参加土改，因为他精通当地方言，又识字。这谈不上“参加革命”，就是跟着工作组做些事，因为表现还不错，他们推荐我父亲到南昌八一大学或者人民大学去参加干部培训班。当时母亲正怀着哥哥，父亲就以母亲怀孕为由婉拒了。我哥哥还是在江西出生的呢。父亲不继续参加工作，这里面肯定有原因，至少说明他革命的意识不是很强。他是个怀才不遇的人，有才华，有抱负，如果在土改后顺应潮流去大学读书、培训，很可能就是干部了。

母亲怀我的时候，我家已经在屯溪了，但快要生我的时候，父亲在歙县的深渡镇搞照相。深渡离屯溪应该在一百公里以内，和浙江的千岛湖交界。我母亲去看父亲，就把我生在深渡了。以前徽州的木材、茶叶、农产品、日用器物要运出去，都是靠水路，先要经过深渡，一直往下，到达今天的千岛湖，再往前就是富春江、桐庐那一块，然后是钱塘江、杭州。

因此，我是土生土长的徽州人、屯溪人。

父亲的职业是照相。我出生时，土改结束了，他已经开了一家照相馆，我母亲说他的生意非常好。我出生那天，他

的营业额达到一百六十块钱，那时候这是很大一笔钱了，我父亲特别愉快。我家里总共有四个孩子，哥哥比我大四岁，我是老二。弟弟比我小两岁，1957年生人，现在他们两个都在，跟我一起做漆。还有一个妹妹，去世了。那时候，我母亲不用工作，生活倒还好。

当时，我们家住在太平县，父亲到黄山，也可以到汤口镇照相，两地都属太平。我们曾在太平的谭家桥住过，家门前是条街，后门通到河上，很典型的水乡住户，街不很宽，也不很长，街上有各种店铺。

那时我不过三岁左右，哥哥六七岁，常带着我玩。我记事比较早，幼年的一些情景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

我家门口有石板台阶，我常坐在台阶上玩。每天有很多卖菜的人经过，还有卖山楂的，用白线绳把野山楂串在一起，像项链一样，五分钱一串；村口有座桥，桥下边可以洗衣服，桥头是饼干店，烘焙的时候很香，会飘到我们家里来；我们家院子后面的河畔草坪上长满了无名的花，花瓣绿绿的，可以弯过来，后来很少见过这种花了。

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一次发大水，水漫进家里，好像有个锅浮了起来，慢慢地要漂到外面去。我对水没有恐惧，反倒觉得有趣，我和哥哥想要把它捡回来。这时父亲进来了，裤腿卷得很高……还有一次，父亲跟一帮朋友有说有笑地抓青蛙回来，一下子就能把青蛙的整张皮扒掉。我们在边上看，青蛙肚子里还有很多子。我们把青蛙烧着吃，很愉快。

父亲就在家工作，他的照相馆也不是很正规，摄影棚

什么的都没有，里面挂着一块布，上面画些风景。当时的相机很大，由三条腿支撑，底片是从后面插进去，要照多少寸的，就抽一下。为防止底片曝光，上面盖着一块黑布，父亲把布往身上一披，拿着一个球，拽一下就照好了。

父亲在谭家桥做照相生意时，我跟着他住。母亲带着哥哥和三弟在屯溪操持家务，有时也来谭家桥帮忙。那时我很小，对母亲印象不是很深。记得有一次我们早上起来，她把我抱到床上，父亲给我拍了张照片，母亲笑了笑。

母亲很慈祥，非常爱我们。她常常把一个瓦片放在膝盖上，瓦上有点水，上面放块布，把麻的纤维搓成线，用来给我们纳鞋底、缝冬衣。布也是自己裁剪，我们兄弟几个的棉鞋棉衣都是她亲手做的，冬天穿在身上很暖和，现在想起这些心里也很温暖。我母亲上过小学，能识字读信，在她心里，丈夫和孩子就是她的全部，她相夫教子，从无怨言。因为家中不宽裕，她还去卖过青皮柿子，从哪儿买的不知道，吃力地背着很大一筐，烈日炎炎，浑身是汗，在街边叫卖，称好后还用刨子把皮削掉再给别人，就这样赚取一点差价贴补家用。

父亲白天去汤口照相，把我放在别人家照料。那家人开了一个餐馆。他们把竹子一节节破开，做成导管，把山泉水引到院子里。院中一盆盆清水里，浮着很多剥了皮的新笋。笋子一节一节的，上面的嫩，可以吃，下面的笋筒老，但有节，中间是空的，不像竹子那样硬。我用一根细竹片，像牙签一样，往笋节里一插，就做成了一把小水勺，可以舀水玩。

我们屯溪的家在老街附近，屋前不远就是一条大河，水很清。洗衣服、喝水都用河水，水路运输也非常发达，船民常常去疏通河道。各种各样的船，有大有小，到傍晚成排成排地停泊在江边，这是一道景，叫“屯浦归帆”。还有泛排的，就是把木头打眼，一根根串成一排，到了汛期，把木排从上游的流口、休宁一直泛到新安江、富春江，卖给别人。自古以来的贸易都是通过这种方式。现在这种木排没有了，因为陆运比较快，水路运输几乎消失。

我印象挺深的是1960年的自然灾害，很多地方闹饥荒，没有饭吃，甚至有人饿得只能吃野菜和观音土，但对我们的冲击不是很大，我们只是吃得差一些，还有的吃。因为我父亲照相还是有收入的，人缘也比较好，可以搞一些粮票和米回来。我们也到田里去挖野菜，再买点萝卜，放很少的米，煮了一起吃。那时只要有的吃，就是幸福的。父亲还是做他的生意。我们没有那种快饿死的状态。

我六岁时，因为吃的不够了，我们举家迁到江西，到大姨家住。她家在江西丰城的淘沙镇，这是丰城的乡下，大姨家住在一条小街上，开了一个小店，生活还过得蛮好。店里有个大石臼，大姨夫把煮熟的热糯米倒在里面，用一根长木槌捶捣，捶好后的糯米很黏，可以蘸着糖吃。当时碾米都用水牛，牛眼蒙着，转着圈拉磨碾米。大姨把我抱到牛的背上，我骑在牛背上跟着碾子转，我至今还记得碾米发出压榨的响声和牛粪的味道。

在那边我们生活了大概半年或者一年，就回来了。

我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好，因为再困难还是有的吃。在自然灾害期间，我看过一个小姑娘站在那儿吃玉米饼，金黄金黄的，当时我想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。后来才知道她父亲是空军。

我还记得奶奶。她很勤劳，常带我们到山上种南瓜、种菜、种芝麻，也种山芋、玉米。我们还帮着挑粪肥。我很小，是挑不动的，就跟她到山上做点事情。她很喜欢我。她在家里养着猪，卖点钱可以够生活开销，杀猪的时候会让我们过去，有一次还炖了猪蹄。她抽水烟，也用竹烟袋杆抽烟，一根中间空的管子，我们用火媒帮她点火。火点好，吹的时候有窍门，吹一下停住，火马上就有了。她把烟抽完，吐掉，我们又装，又吹。她一边抽烟一边给我们讲故事。我们跟她很亲近，在一起很幸福。

我儿时没有受过特别好的教育，但父亲对我有影响，他不但会照相，而且有文化，能写能画，八十年代江西老家修宗谱，就是他写的。他也爱刻字，记得小时候他喜欢抽旱烟，在烟袋杆上刻了“可以清心”几个字，他还在象牙筷子五毫米见方的筷头截面上刻印章，平时也喜欢跟人一起谈论文章、对联和书法。他性格耿直，比较倔。

父亲让我们每天写一张大字，毛边纸黄黄的，折叠成格，在上面描红，后来写正楷，又写柳体、颜体和赵体。父亲还给我买了一块墨，估计不贵，但磨墨的时候很香。字写好了，我们要把砚台洗净，那时候还没有讲究的歙砚。

这都是小学以前的事情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

我八岁上学，在屯溪三小就读。那是政府办的正规学校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，每个年级三个班，一个班五十多人，很满的。因为离家较近，我与同伴一起上学、一起回家。现在这个学校已经并到屯溪七小了。我三年级的数学老师还健在，非常巧，就住在隔壁，年龄应在八十岁了。

记得报到第一天，是母亲带我去报的名，但户口本什么的都没有拿。班主任姓金，是位女老师，四十岁左右，她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说叫甘而可。她说：这个名字奇怪，这样也可，那样也可，这样好啊！她理解为一二的“二”了。我那个时候也不懂，就记住了这样一句。其实，我的名字一直是“而可”——小时候我有一张照片，应该是两岁前后拍的，我光着头，穿着背带裤，把手含在嘴里，照片上就有“而可”两个字，是父亲用墨写在底片上洗印出来的反白字。

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，我们坐在安排的位置上，教室桌子比较小，两个人一张，桌面灰灰的，黑板黑黑的，总归进入一个新的环境，因为父母不在身边，心里头非常虚，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。老师用粉笔在上面写了什么都记不清了，但发新书本的时候，那油墨香我现在还记得，本子是一个个格子的……放学了，我们说：老师再见。我懵懵懂懂有一个奇怪的想法，老师也要去吃饭的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那天我背着书包，也没有人接，也没有人送，我就知道怎么回家来。

课程主要是语文、算术、绘画三门，有音乐课，但没有课本。上课以语文、算术为主，一个星期两节音乐课，还有

体育课，做广播体操，还有一些书法练习，就是描红。学汉语拼音时，我为拼音字母纠结了很长时间，感觉很难学。因为小时候父母亲说江西话，跟我说屯溪话。我在小学才开始学说普通话。

绘画课有点印象，我画得很丑，只要完成就可以了。二年级的时候有音乐课，桌子一排排的，我们站在桌子中间，先唱歌，再跳舞。学的第一首歌我现在还会唱：

我家种大西瓜，天天除草天天去看它，发了芽，开了花，结了瓜，瓜呀长呀长，西瓜呀慢慢大，我们抱呀抱不下……

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们搬到新的教室，那是1965年。我成绩好，是班上的学习委员，负责收书本。三年级的班主任、语文老师叫汪芙蓉，常常把我的作文在班上读。一篇在课上念过的作文写的是我哥哥当民兵，他怎么参加训练：早上顶着凛冽的寒风，排着整齐的队伍进行操练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喊着“一二一”的号子。我哥哥比我大四岁，已经上初中了。

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代表三班参加了全校书法比赛，还获了奖。我对绘画也感兴趣，小学一二年级元旦的时候，我们班上流行给同学送礼物。我们先在纸上画天安门：上面一个城楼，下面一个城楼，城楼两边有角。然后用刀刻，哪些部分该剔掉、哪些部分要留好，还要连着不能断——那时我都懂得怎么做。然后下面附张纸，用牙刷蘸着红墨水在刻纸上来回刷。最后把上面的纸掀掉，下面的纸上就印出了天安门

的红色图案。我们把这当作礼物送给老师和同学。这事我都忘记了，后来老同学在聚会的时候还讲：你的礼物是班上刻得最好的。

我小时候没有想过长大要做什么，因为生活还不错。一直到了“文革”，父亲的收入来源断了，我们家生活才苦了。

学木工

父亲的照相工作一直做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照相行业在当时已属特殊行业，要经过公安部门批准才能做。因为没有拿到许可证，他不得不停业了。为了家人生活，父亲就给别人写写画画，写标语、画人像。当时新安江宾馆位于交通要道，他在侧面一堵墙上画了一幅三米左右的毛主席挥手像，他还给许多地方写毛主席语录，都是要收费的，这成了我家的主要经济来源。

“文革”爆发时，我不过十来岁，印象中先是到处散发传单和小卡片，上面印着毛主席语录。大人撒了以后，我们小孩捡，看谁捡得多，我的东西跟你换，你的东西跟我换……慢慢有了游行、工人造反司令部，接着分成了两派，左派右派的政治观念不一样，常常进行辩论。那时候，你不是这一派的，就是那一派的。你想逃离，过真空的日子，不可能的事儿。对孩子来说，父亲是哪一派他就是哪一派，或

者母亲哪一派他就是哪一派。父亲跟我二叔两个人观点也不同。每天二叔都会到家来坐坐，说得不好两个人就争执起来，不欢而散。二叔讲：我再不会来了。但是第二天又来了。他们的感情还很好。我们小孩也在看，辩论的人都有才华，开始非常斯文，后来就变成了激烈的冲突。

我记得屯溪有个黄梅剧团，团长叫高彬，他被打成走资派，黄梅剧团的演员牵着他游街，他头戴高帽，手打着锣，打一下说一句：我是走资派高彬。“哐”……我很小，跟着看热闹。牵着高彬游街的女同志有点不忍心，她对我说：小鬼，你来牵。我们觉得好玩，就牵着他游街。再后来发展到武斗，开始是用一节红一节白的棍子，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，再到有一派得到军方支持，军分区给了枪。那时民兵组织都是有枪的。人和人之间是那么残忍，其实很多是兄弟、亲戚、好朋友，由于观点不同，站在两派，好像死敌一样，结局很惨。

当时搞群众专政，屯溪有个地下刊物被查封，书法是用钢版刻的。他们怀疑是我父亲，就到家里把他抓了去，抄家把地板都起开了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但把我父亲关押了。父亲到那里也不服。他说：你们凭什么抓我进来？那里面的头头讲：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群众专政指挥部，权力很大的，你还敢在我这儿猖狂？我父亲说：错了！你这是专政群众指挥部。他把这个词改了一下，性质就变了……

当时我叔叔婶子在外地出差，他们的小女儿需要人带，

我帮着他们带孩子，还没有住上一个月，父亲就遭到飞来横祸。我们赶回来后，听隔壁邻居说：“你爸爸被抓了！”虽然经过审查，他没有事，第二天就放了，但我们心灵上受到的冲击蛮大的。

“文革”以前我们家是非常幸福的，“文革”以后也算不上不幸福，但对我产生的阴影是有的。父亲放回来很长时间，因为没有公安局发的执照，不能营业。乡下管得不像城里那么严，他就到乡下去照相，翻山越岭为农民服务，我哥哥陪他去。后来哥哥工作了，我就跟父亲从山这边走到那边，帮着点点钱。那年我十四岁。

后来，乡下也不能照相了。他就用手上这点功夫赚点钱，给别人写东西，也给别人做有机玻璃的匾和招牌什么的，把字贴到有机玻璃上，然后锯出字形。我们的家境每况愈下，母亲不得不在建筑公司做小工，拌水泥，一天一块钱，工作非常辛苦。我们兄弟看了都不忍心。

我哥哥十六岁招工到屯溪造纸厂当学徒工，工资很低，十八块钱一个月，即便加上父亲的一些收入，维持生活还有点困难。母亲做小工很累，父亲闲着很郁闷。不过，尽管生活比较艰苦，吃饭还是没有问题的。我父亲每天还会打二两酒喝喝。

学校停课闹革命，我从1970年、1971年就辍学，初中上了一点就停了。父亲认为学习环境这么差，我在学校里混，也不是个事儿，读书也没用，还不如学门手艺好一些。

我没把书读完，是有点痛苦的。但父亲认为，那时无论

初中还是高中毕业，都要上山下乡，可能分得很远，继续学习是没有用的。他说了一句话，“荒年饿不死手艺汉”，这是古训。读书还不如学一门手艺。手艺很多，砖匠、石匠，都是站在外面做，也苦，木工还轻松点。于是，他让我选择木工这门手艺。

那时我堂哥碰巧在屯溪木器厂工作，我就跟着他做下手，开始刨刨钉钉，这样他的产量就比别人高，其他同事有意见了。我不能继续在那厂里做，就回家里买点当柴火的粗料，用堂哥给我的简陋工具自学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，整个社会乱了套，刘少奇被打倒，国家主席这么高的地位，还是叛徒？还有彭德怀、陈毅、贺龙这些老师，一下子都变成批斗对象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林彪事件对人们触动更大。那时我们还小，对政治不敏感。老一辈人懂了，但心里可以想，嘴上不能说，因为你说错一句话就是现行反革命。从那以后，人们什么都不信了。啥都是假的，学门手艺倒可以谋生。

我自学木工，从劈料开始练，用斧头把圆料劈方，然后弹墨线，下锯之前，要把锯子锉快，还要把锯齿向左右劈开一些，让它的锯路宽一点，然后用脚压在圆木上面就锯。料都有自然弯曲，翘一点，刨直，再锯开，一根料变成四根，再算好尺寸画线，锯，刨，再打榫卯，组装就行了。

我爱钻研，心里也总想着，老的东西看看，别人做的时候也看看，一点点地学。

我做的第一件家具是一个小板凳，照别人的样子做的。